



【言为心声】

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平行的关系,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商言商的历史思辨

乔新生

最近,知名企业家柳传志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他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究竟该保持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曾有学者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越是发达地区的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越密切,越是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越紧张。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但也要看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平行的关系,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则,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几乎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从企业的登记成立到企业的市场经营,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政府积极参与。只不过在沿海发达地区,政府官员的素质普遍较高,因而在与企业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习惯于按照法律规则办事,不仅与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且与企业建立了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家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产品的开发和市场的拓展方面,以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赋税回报社会。这是一种良性循环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虽然也存在腐败问题,但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政府官员多数已经充分了解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此,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发生法律关系的时候,能够掌握好分寸,处理好主从关系。

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经济欠发

达,政府官员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越俎代庖,干了许多政府官员不应该干的事情。正是由于政府官员急于求成,在招商引资和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不断地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结果导致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之间正常的合作关系变成了不正常的利益关系。现在中西部一些地方流行“招商引资,关门打狗”政策,企业家上门投资的时候,被政府官员待为上宾,可是,当企业获得丰厚利润的时候,一些政府官员摇身一变成为流氓恶棍,他们不仅吃拿卡要,而且采取一切手段侵吞企业家的财产。新闻媒体披露的大量案例说明,中西部一些地区投资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当地政府官员为了掠夺企业家的资产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一些企业家才会发出感叹,认为企业家应当在商言商,绝对不能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如果企业家关心政治,为政府官员出谋划策,那么,最终有可能会“赔了夫人又

折兵”。企业家恪守自己的本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麻烦,同时又可以巧妙地回避政治漩涡,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独善其身。企业家的告诫,既说明我国的经营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同时又说明,企业家必须学会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明哲保身。

和中国企业家的消极态度不同,自11世纪至今,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从来都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财富,而且充分发挥财富的力量建立了公民社会。西方国家的分权制衡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脱胎于中世纪的公司制度。当地中海沿岸的城邦国家比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建立股份制企业,他们把资金集中起来购买货物装上轮船,漂洋过海到阿拉伯的亚历山大港销售,这种被称之为“海上协会”的组织,逐渐演变为股份公司。当代各国公

司法的许多制度,都脱胎于“海上协会”。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商业组织的完善,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们开始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制定属于自己的商业规则,并且建立相对独立的仲裁法庭按照自己的规则处理商业纠纷案件。各国的统治者将企业家制定的规则通过立法程序加以整合,从而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许多国家制定商业法律规则的时候,仍然沿用这种传统做法,由商会或者商业自治组织起草法律草案,然后提交国家的立法部门加以认可。这说明企业家在商业社会不是被动地被管理者,而是社会的建设者,或者说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中国的企业家既要有恪守本分的分寸感,同时又要有历史的使命感,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建言献策。否则,企业家的社会影响力就会下降,公信力也会受到质疑,也很难成为真正优秀的企业家。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经济解释】

我们看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会高增长,可是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成本上升其实是一回事。

谢作诗

有人说,劳动成本上升给制造业带来困难,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个说法其实不对。

在没有人干预的市场上,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所创造的价值。劳动成本自发上升,一定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企业不是福利机构,老板不可能赔本发工资。你要创造3千块的价值,老板才能给你3千块的工资。生产率提高,这只会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

如果没有制度阻碍劳动自由流动,那么这个企业因为劳动成本上升做不下去了,一定是劳动在另一个企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不可能任何企业生产率都没提高,却有人工资提高了。众所周知,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导致经济增长,因为工业部门

的劳动生产率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我们看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会高增长,可是我们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成本上升其实是一回事。

逻辑上,在一个没有人为制造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劳动成本越高,经济增长应该越快才对。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劳工成本高,经济竞争力低,这只是表象。西方经济缺乏竞争力,不是劳动成本高本身的错,而是因为他们的高工资是人为拔高的,而不是市场决定的。

中国没有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怎么会因为劳动成本上升而会减缓经济增长呢?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人为的拔高,公务员的工资就被人为拔高了,而最低工资、工资集体协

商也正在开坏政的头。

中国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制约了劳动的自由流动。像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劳动成本到底有多少是户籍、医疗、教育等制度推高的?为什么中西部低成本的劳动不能流向沿海地区?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雇到低成本劳动的话,那么沿海的劳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户籍限制、孩子上学难等问题大有关系,是它们制约着劳动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减少了沿海的劳动供给,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如果我们不区分劳动成本上升的原因与性质,简单把制造业的困难归结为劳动成本上升,那么就会误判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难与中国的增长前景。

有些人不负责任,主张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假如你做内需,那么转移到中西部去没问题,但

你要是做外需的话,那是绝对不行的。在古代,经济中心原本在中原,为什么到了近代转移到了沿海?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当今是全球化时代。面向全球生产,沿海具有天然的优势。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把人转移到沿海来生产成本低,还是将原材料和产品运来运往在内地生产成本低?难道古代的中原人勤劳智慧,而他们的子孙却愚笨懒惰不成?难道古代的沿海人愚笨懒惰,他们的子孙却又勤劳智慧不成?

中国要想办法通过制度变革把沿海的生产生活成本降下来,而不是把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去。但现在我们好像在向相反的方向走,中国还要避免人为拔高工资和福利。想明白其中道理并不难。如果通过人为提高工资和福利就能改善百姓生活,那就把最低工资规定到每个月10万块,岂不是我们个个都成了千万富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伴的劳动成

本上升永远都是好事。若说一国增长的基础是低劳动成本,那岂不是成了笑话:为了经济增长,倒要有意的压低工资收入了?而压低了工资收入,经济就总是能高增长了?可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高增长不在劳动成本更低的非洲,而在劳动成本更高的中国。何况,我们发展经济不就是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如果劳动成本不上升,那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怎么提高,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但是,要克服和避免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劳动成本的推动。任何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因素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都只会给经济带来噩梦,最终让人民不能过上好日子。切记,不是劳动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而是制约劳动自由流动的体制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



【贾语村言】

商人逐利,要选择最“经济”的路径,他们如此热衷于攀龙附凤,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错位。

攀龙附凤的商人们当以贾府为戒

贾壮

最近,资本市场接连发生几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失去联系”的事情,其中有人见人爱的美女老板,有极具盛名的地方首富,还有多次获奖的先进个人。已经披露的信息显示,几起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落马官员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在走向困顿的道路上,官员和商人经常结伴而行,就像是瓦岗寨里的王伯当和谢安登。这种现象折射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政商关系存在严重的扭曲。有哲人说,小说是隐去了地名和人名的历史。在《红楼梦》里面,大文豪曹雪芹为世人展现了一段精彩的

政商关系破裂史,经商者可引以为戒。贾府之所以能成为“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固然同祖上的彪炳战功密不可分,但宝玉时代的荣华富贵要维持,全得仰仗胞姐元妃的凤体安康,用现在商人们的话来说,应该叫做“走好上层路线”。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政商关系注定不会牢固,再加上元妃的身子不争气,待到“虎兕相逢大梦归”,贾府便作鸟兽散,才女们不是“寒塘渡鹤影”,就是“冷月葬花魂”,最后留下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对于贾府赖以生存的政商关系之脆弱性,府上草草辈媳妇中的优秀代表秦可卿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曾经在贾府首席执行官凤姐的梦中语重心长

地劝诫,“有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读书旧族了”,而且她还为贾家指明了一条摆脱政商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读书务农,只可惜吃惯了官家饭的贾家男女利令智昏,未能听进去这逆耳忠言。

反观中国现实,近些年来犯事的商人们,很多都是在经营政府关系时走上不归路。商人逐利,要选择最“经济”的路径,他们如此热衷于攀龙附凤,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错位。地方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一些手握重权的腐败官员

会通过干预市场的方式来谋取私利,既然攀上高枝便可一本万利,商人们自然会对经营政府关系乐此不疲。所以说,打破扭曲的政商关系,首先得从政府职能转变入手,让市场规则取代官员权力,试想,如果贾母不用给自己的孙女行跪拜大礼,贾政见到宫中太监也不至于战战兢兢。

因为政府对市场有过不恰当的干预,有些商人经常会抱怨:这么多顶“大盖帽”管着,不想想办法能行吗?的确,在存在灰色地带的营商环境下,对拥抱权力的商人们进行道德批判也许有失公允,但要是把扭曲政商关系的责任都推给官员也不合适。面对同样的环境,为什么有的商人就可以“站着把钱挣了”,而

且做得非常成功呢?那种整天热衷于经营关系的商人们,是不是也应该反省自己总想走捷径的投机心理呢?可以看到,有不少贪官是玲珑的商人们精心培育,就像是当初薛宝钗进宫参加选秀女一样,那可是抱着入住椒房的雄心的。

有些经济研究者将企业家才能作为劳动、土地和资本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才能可以将前三种要素合理组织,发挥最大的生产效率。建立市场经济需要重视企业家才能,但企业家应该将更多的才能用于企业经营,而不是去经营官员关系,如果总是将企业的命运与某位不轨官员的政治生命捆绑在一起,迟早逃不掉类似贾府的命运。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江湖论道】

遇到一时的困难,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的选择,最好换个角度看问题,换种方法解决问题。

换目标不如换方法

陈道林

笔者每天途经武汉光谷大道开车上班,裹挟在缓慢移动的车流之中,都有插翅难飞的感觉,通过三环线路口时,一般都要等上三四个红绿灯才能长舒一口气。四年前,我刚搬到藏龙岛的时候,曾经享受过短暂的畅快,能够开到60公里的时速岂不快哉?随着光谷金融港以及诸多企业、楼盘的落成,光谷大道沿途红绿灯翻番增加,车速一点一点变慢,畅快的感觉很快消失殆尽。最新的消息说,这条通车才12年的光谷主干道,现在已经启动高架桥的建设,准备铺设“快速通道”来提高

通行速度。

光谷大道这四年来的变化之大,超出了我的想像。类似这样的“想不到”的情形,在生活中其实并不少见。十年前,当我为十多万的首付踌躇的时候,当时最真切的想法就是人到中年能把房贷还清,完全没有想到后来还会买车买房。我在今年初盘点学校去年的“业绩”时发现,网站的建设、教材的修订、异业机构的合作、管理构架的调整、校舍纠纷的处置、教研机制的形成……不少难啃的骨头居然都啃干净了,不少难干的事情居然都完成了!

平时感觉可没这么好。一天或者一周下来,拟定的计划难免有或多或

少的欠账,有时因为突发的事情,有时因为临时的接待,有时仅仅多浏览了一会儿网页,在微信、微博上多停留了一会儿,好端端的计划就走了样,甚至泡了汤。总有这样或那样不爽的地方。

这种快与慢的反差,蕴含着一种有趣的现象。人们常常高估自己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目标,却往往低估长时间能够达成的计划。常见的情形是,我们过于在乎眼前的利益、当下的感觉,过于计较一时一地、一城一池的得失,经常陷入到患得患失的惶恐之中,一有风吹草动就失去了定力和分寸,容易动摇和改弦易辙,把“我们为什么要出发”或者“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两个

更为根本的问题忘在了脑后。

不久前,一个即将转正的员工辞职走了。临走前我和她谈过一次话,她说自己原本打算找一份和专业相关的工作,可是这段时间她教学能力提升缓慢,尤其是和正式员工相比,“干同样的事情工资少多了”,心里很不舒服,准备换一份和专业不相关的工作。我理解她的心情,但是并不赏识她的思维方式。

我给她的建议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换目标不如换方法。提升缓慢是不是方法不对?和正式员工存在收入差距正好说明还有奔头,为什么看不到和正式员工能力上的差距呢?遇到一时的困难,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的选择,最好换个角

度看问题,换种方法解决问题,逐步缩小和目标之间的差距。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积小胜为大胜,收获一个让自己都吃惊的结果。如果几经周折,发现确实此路不通才考虑回头不迟。

古人有云:“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只可惜现在焦虑症常常困扰着我们,急于求成常常灵魂附体,不少年轻的朋友们目标换了一个又一个,思维还是停留在过去,能力未见有长进,结果事与愿违,与好工作、好“薪情”失之交臂,甚至渐行渐远。要知道,朋友是老的好,酒是陈年的香,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作者系武汉快乐学堂创始人)